

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戰略*

陳麒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韓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崇涵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摘要

當美中兩大強權在東亞仍然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時，避險（hedging）遂成為亞太國家一個務實且富有彈性的外交政策選擇。本文認為，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在學理與實務上確實與傳統軍事聯盟存有差異。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缺少意識形態對抗的背景下推動「夥伴關係」外交，透過改善對外關係而拉攏國際支持，進而使得周邊國家享有更多採取避險戰略的空間。南韓作為美國的亞太盟國，在美中之間的避險即為一項例證。本文認為，除非國際情勢與國際結構有明顯變化，短期之內中國應該不至於放棄「夥伴關係」外交。亞太國家也將會繼續採取避險戰略。

關鍵詞：避險、夥伴關係戰略、中韓關係、美韓關係、亞太地區

* 本文為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視亞太國家避險策略」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04-044 M2）。作者感謝科技部補助。本文另接受「教育部大專院校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經費補助」。作者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審查意見。本文若有疏漏之處，由兩位作者共同負責。ORCID: 0000-0003-0898-377X

壹、前言

傳統上，國際關係學界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戰略簡化為抗衡與扈從（Waltz 1979）。冷戰結束以來，許多亞太國家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開始採取了第三種可行的路線—避險（hedging），也引發了學術界的討論。亞太國家在美中的競合之間，適度的調整其戰略，並採用更中庸的策略選擇，都可以視為避險的一種展現。本研究將試圖討論並補充說明亞太國家在後冷戰時期得以採取避險，維持與美中兩大強權在安全與經貿上交往的可能因素。

過去研究指出，亞太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在面對中國崛起時，並沒有完全遵守現實主義者提出的抗衡或扈從戰略，反而是在美中兩強競合的背景下，選擇了避險。論者認為，這種避險代表國家在面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時，傳遞模糊訊號，主要想維持自身軍事安全的獨立性（Lim and Cooper 2015）。然而，中小型國家得以採取避險，通常是在大國容忍的情形之下。一旦大國要求其必須選邊時，中小型國家便失去兩邊同時討好的不選邊政策（吳玉山 2009, 41）。奠基於此，郭清水（Kuik Cheng-Chwee）指出若干影響決策者採取避險的時機點（Kuik 2008, 165; 2016）。包含國家缺乏立即的外在威脅，或國際現狀缺乏明確的意識型態分立，最後是世界強權缺乏敵對狀態。這些基本外在條件主要是以「體系層次」（system level）來分析國家採取避險的重要構成要件與限制。

然而，在往後相關研究論述中，學者專家較少針對國家得以採取避險戰略的前提條件論述說明，並作出較為明確的論述，多半關注在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動機與類型，誠屬可惜。因此，奠基於過去的相關研究，本文對於國家採取避險戰略在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前提條件激勵／限制因素進行闡述，並期望經由深入的討論，尋找國家採用此戰略的可能動機背景。本文將比較美中兩國對於聯盟政策的差異性，說明亞太地區目前因為缺乏類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激烈對峙，中小型國家較易採取兩面交好的避險戰略。

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將利用中國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為例證。中國所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並不以政治立場的異同為根據，甚至也涵蓋了幾個主要競爭對手，而是否存在彼此敵對的意識形態是屬於「體系層次」的範疇。簡言之，意識形態差異的弱化是影響亞太國家避險的主要「體系層

次」因素，而中國發展的「夥伴關係」則是對於亞太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產生了鼓勵效果。因此，本文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輔以中國「不結盟」政策背景下發展出的「夥伴關係」外交特色，說明亞太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政策環境，希望彌補學界目前在避險研究中「體系層次」分析的缺憾。

本文將從避險的理論概念以及國家採取避險的動機出發，說明意識形態作為「體系層次」變項的分析重點，並介紹在此背景下，中國延續冷戰時期的「不結盟」政策立場，在冷戰結束後發展「夥伴關係」的內涵。藉由選取美國的亞太盟國之一——南韓為例，說明首爾在軍事與政治上獲得華盛頓的安全保障，但是在經濟上則可以對北京保持友好合作關係。實際上南韓正是採取了避險戰略，其外交政策作為符合避險戰略的條件與特色。本文以南韓作為案例的原因在於，中國與南韓於後冷戰時期才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南韓作為美國的軍事盟國長期受到安全保護，但是近年來在經貿上卻與中國相當密切。¹ 本研究探討之問題在於，當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中民主與共產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對峙的局勢緩和，中國一方面繼續維持「不結盟」政策，另一方面也推動「夥伴關係」外交來改善與強化對外政策影響力，這些外部因素如何促成了南韓得以採取避險戰略。然而，如果國際體系中出現明顯意識形態對立的態勢時，與中國交好就容易受到民主陣營的排擠，或者當國家面臨更明確的威脅時，就會尋求安全保障而非經濟利益，此時就無法採用兩面討好的避險戰略，勢必要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選邊合作，以免遭受安全損失。

貳、理論與背景

學術界長久以來習慣運用「抗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的二分法來簡化解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戰略。但是在檢視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國家對於中美兩強的外交策略時，就存在部分案例難以解釋之處。過去

¹ 本文主要研究目標在於探討南韓採取避險戰略的外部因素分析，並輔以中國與南韓的互動關係做出說明。本文並非採用實證主義來對超國家現象建立任何理論通則，而是在對理論的探討與國際現勢的分析下，對南韓進行深入剖析。南韓的例證可以做為亞太重點國家參考案例，但未來仍需觀察各國本身政治結構與對美中關係，再行個別研究分析。

學術界對抗衡與扈從的看法也較為分歧。舉例來說，華爾滋（Kenneth Waltz）認為國家往往傾向於抗衡實力較為強大的對手而不是扈從靠向對手（Waltz 1979）。瓦特（Stephen Walt）則認為，國家傾向於抗衡對手，主要原因在於對手具有威脅性而不見得是對手的實力超過我方（Walt 1987）。然而，施韋勒（Randall Schweller）則持相反意見。他認為扈從並不一定是指國家被迫做出妥協的退讓，因為其本意是積極追求利益。國家試圖改變或維持現狀的行為，會吸引其他抱持著相同立場的國家扈從追隨，並非總是激發其他國家的抗衡。畢竟抗衡比起扈從將花費更多時間與成本，而扈從將更具有節省成本與預防衝突發生的可能性（Schweller 1994）。實際上，國家在權力增長的過程中，是否會引發其他國家的抗衡或扈從，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其中就包括了：彼此的權力差距（Fiammenghi 2011, 136-143）、對手國內政治因素（Schweller 2006）、自身或對手的地緣戰略位置（Mearsheimer 2001），以及國家互動以後對於彼此的外交傾向是否產生改變（陳麒安 2014, 107）等。

至於國家是否真的會為了利益而扈從鄰近的大國，美國政治學者雷克（David A. Lake）認為，從屬國會臣服與接受支配國的指揮適法性（Lake 2007, 51）。在扈從策略下，國與國之間有一個領導與從屬的關係，這種從屬關係就是連結兩國最主要的脈絡。然而，扈從策略也意味著從屬國對於領導國要有一定程度的付出，非強權國家扈從大國的代價有時相當高，並非全然沒有風險。扈從基本上是指小國靠向大國的合作關係，但是可以進一步分為主動追求利益的「順從」與被迫妥協選擇的「屈從」行為（陳麒安 2014, 101-102）。特別是在「屈從」關係中，小國必須聽從大國的指揮，並在相當的程度下，犧牲一部分自主決策的權利。

一、避險的定義與測量

學者近來開始討論有別於抗衡與扈從的第三種可行路線，避險（hedging）遂受到更多重視。避險是國家在其生存戰略中的一種「求保行為」（insurance-seeking）。在國際關係中，不同大國都可以運用本身的軍事、經濟實力或其他影響力，給予中小型國家所需要的資源。這時中小型國家就要思考，來自大國的影響力是否大到足以影響自身安全與利益。特別是當影響力的來源模糊而多

面向時，受到影響的國家決策者很難立即做出必須抗衡或扈從大國的政策。此時不向特定大國選邊靠攏的避險戰略便成為可以保護自身利益的戰略之一。

在避險的定義上，國際關係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部分學者主要是依據東南亞各國在對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上，發覺各國的外交避險戰略有別於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或扈從的觀點（Acharya 2004）。有學者認為，避險是「包含了所有面對未來安全威脅的可能選項」（Roy 2005, 306）。簡言之，避險並不是單一策略，而是由多種不同策略組合而成。另一派學者認為，避險是中小型國家在兩強權間試圖保持等距離（*equidistance*）。為了保有彈性，不隨意加入兩大強權的聯盟當中，也是在抗衡與扈從光譜之間的一種策略（Le 2013; Kang 2007; Kuik 2016）。² 進一步來說，學者將避險視為除了抗衡或扈從之外的另一種可行策略。

對於避險的另外一種定義，也有專家認為要從「安全利益與承諾」來討論（Goh 2005; Ciorciari 2009; Lim and Cooper 2015）。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林德倫（Darren Lim）對避險做出較具操作性的解釋（Lim and Cooper 2015）。他們主要是從非強權在與強權之間「安全承諾」多寡來分析「避險」的內涵。意即，避險主要是非強權與強權之間「安全承諾」的親疏遠近。非強權若能在安全上維持某部分的自主，不要太過依賴強權的安全承諾，則其較能掌握自身國防外交上的自主權。反之，若太過依賴強權的軍事保護，反而無法維持自主性，進一步喪失對風險的掌控，如此就不能採取避險。因此，與強權安全合作較深的國家，採取避險策略的機會將越少，而與強權在安全上合作較少的國家，越能實現避險策略。

此外，學者吳玉山將避險與樞紐（*pivot*）做進一步的區分與闡述。樞紐是小國在兩大強權之間保持等距，不斷來回擺盪以換取最大利益，但缺點是可能會被兩強壓迫處罰。避險則不太一樣，是小國不願承受高風險，也不願意與

² 文中所謂等距（*equidistance*），指的是小國與強權關係上，儘可能保持相對平衡，不全然抗衡或扈從的對應關係。新加坡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認為小國可以採用「全方位糾纏」（*omni-enmeshment*）來維持等距（Goh 2007, 121），郭清水認為等距即是小國「維持中立」或「非結盟關係」（Kuik 2016, 173）。本文認為的等距是指小國儘量與強權維持相對友好關係，而非做到與強權完全等距。

兩大強權相綁在一起，卻同時與兩強交往。簡單來說，小國就算與一強交好，但仍會與另一強保持良好關係（吳玉山 2020）。但是當兩強逼迫小國選邊站時，這時避險國家就失去彈性，必須做出選擇。若以經濟與安全方面來看，避險是與一方改善經濟關係，但又尋求另一方的安全保障（吳玉山 2009）。鄭敦仁與徐斯勤也採用相似的論述，不過他們認為避險是更深一層的「雙邊套利」行爲。他們以日本、韓國，還有東協在美兩強之間爲例，明確指出東亞國家在兩大強權間的互動關係並不適合落入抗衡或扈從的分類（Cheng and Hsu 2005）。

不論是將避險視爲抗衡與扈從之間的選項，或是對於政治與經濟上的需求不一，避險的定義仍需要國際關係學界更多的討論與推敲。因爲若採取郭清水等人的提議，將避險界定爲：「介於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一個行爲措施」，則在尋找可操作的測量時，就會發生甚麼時候可定義爲抗衡，和甚麼時候可以定義爲避險的問題（吳崇涵 2018）。因爲不管是採用質化或量化方式驗證避險的相關因果要件時，都必須將避險的定義做更清楚的劃分。例如在採用量化方法進行相關研究時，仍將避險定爲「聯盟」的範疇較具可行性。因爲若根據郭清水等人之意見，定義避險是「介於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一個行爲措施」，在尋找可操作性測量時，將產生模糊與缺乏「反事實」分析法則（counterfactual）。因此，許多學者在對避險進行定義時，採用林德倫等人所提供之意見，認爲避險是非強權與強權國「結盟」上的「安全承諾」。根據林德倫的定義，大國與非強權國之間的「聯合承諾」（alignment commitment）可成爲測量避險的指標。例如，當美國對亞太國家送出明確的軍事承諾，若該國應允加入以美國爲首的安全體系，在安全上就依賴美國提供保護。時間一久，小國很有可能喪失安全與政策上的獨立性，那避險就無法成爲小國的外交選項。反之，若該國堅守自己的立場選擇不加入美國的安全防衛體系，並保有自身安全與政策上的獨立性，則採用避險的機會將會大幅提高（Lim and Cooper 2015; Wu 2019）。

然而本文在進行相關質化研究時，爲了避免出現定義上的模糊，對避險的定義主要還是回歸採用在國家面對兩大強權的競逐時，將經濟與安全分別投放在兩個不同強權。意即，經濟上向A強權靠攏，但安全上則依賴B強權（吳玉山 2009; 吳崇涵 2018; Khong 2008; McDougall 2012; Roy 2005）。簡言之，如

果有國家對美國在軍事上的聯盟合作程度越高，同時也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保持合作，我們就可以將此國家視為採取了避險戰略。³

二、避險的原因與動機

在確立避險的定義後，接下來將從案例上探討國家採取避險的原因與動機。過去學界對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原因與動機缺乏系統性的討論。首先，許多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可以直接促成避險，這些相關研究多運用國家層次（state level）來分析決策者採取避險的原因。舉例來說，現實主義學者特別重視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並認為國力是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Lemke and Werner 1996; Schweller 1994; Walt 1987）。綜合國力是評估國家強弱的重要指標，也會對於國家選擇聯盟陣營的決策產生影響。因此，當東亞各國面對中國強大的軍事與科技實力，在不確定北京的動機是否純正下，對中國的國力差距將會影響國家避險的意願（Koga 2018, 640）。

有學者認為，當中共在1977年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還呼籲要「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在197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考量，此時還不能排除中國需要建立聯盟的可能性（凌勝利 2013, 23）。但是當鄧小平於1982年在中共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並將「和平共處五原則」適用於各種國家的關係時，就是在「不結盟」原則的指導下，開始淡化了敵友的理念（閻學通 2014; Zhong and Yang 2020, 65）。

本文認為，亞洲各國在後冷戰時期可以採取避險戰略，主要是中國於1980年代開始在對外關係上強調「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的「不結盟」立場（張潤 2014），並在傳統的邦交關係之上，透過「夥

³ 本文主要探討中小型國家的避險策略。在運用避險的定義時，當大國之間的交往也出現將經濟與安全分開考量，亦可套用避險概念來討論。也有學者將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具有競爭也有合作的性質，定義為避險的一個例證（Medeiros 2005）。

伴關係」的建立來加強與特定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互動（寧騷 2000, 4-5; 朱立群 2009, 19）。冷戰結束以來，因為國際間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對抗，中國想要在堅持「不結盟」政策的背景下強化友邦關係，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塑造對其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因此，就有中國學者認為，中國夥伴關係的建立，仍然符合1980年代提出的不結盟、不以意識形態論親疏的原則。如果說不結盟是消極的定義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那麼發展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則是更積極的定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種關係意味著既不存在敵對的高度競爭關係，也不存在盟友（準盟友）的關係，中國努力發展和所有國家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朱立群 2009, 19）。⁴

國際體系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對立，是中小型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主要因素之一。學者認為，意識形態是促成聯盟形成的原因之一，政治體制相似的國家傾向於合作捍衛共同的價值觀，彼此之間比較不擔心會發生戰爭，相互結盟也可以讓不穩定的政權獲得在國際社會中的正當性，甚至某些意識型態的政治訴求就可以解釋聯盟的行為等（Walt 1987, 34-35）。因為決策者往往會將意識形態的差異性作為區別敵友的標準。對朋友容易交心且關係較為緊密，對敵人則較疏離且懷有疑慮（Walt 1987, 39）。在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作為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分別領導其他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各自組成不同的意識形態聯盟陣營相互對抗，形成了兩極體系。由於在這種聯盟體系中，存在明顯的權力差距，不論是個別國家政策發展或群體利益的界定，往往都會反映出權力分配的結果，大國有機會依照自身的利益考量而要求小國配合。尤其是當聯盟體系呈現出不對等的特徵時，大國更會將聯盟關係作為影響或控制小國的工具（Snyder 1997, 12）。

冷戰結束以後，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兩大陣營相互對抗的態勢不再，這也使得部分中小型國家得以基於本國利益而非群體利益的考量，憑藉既有資源、

⁴ 隨著中國軍事與經濟實力自1990年代的快速成長，許多亞太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在面對中國崛起時，並沒有立即採取抗衡或扞從的極端策略。反之，中國周邊國家採取了溫和且富有彈性的避險行為。當時中國外交政策宣傳的主要訴求包括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和平崛起」「睦鄰外交」等（高朗 2004；蔡東杰 2014），較少對鄰國展現出其威脅與稱霸的野心。

地理位置或靈活外交手段，發揮自身實力以擴展外交空間（Cooper 1997）。因此，當國際上有兩大意識形態對立團體產生時，霸權往往會要求與自己意識形態較相近的國家組成聯盟，成為側翼，並且抗衡敵對陣營。但是在後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界線不像以往涇渭分明，這就對於國家採用務實彈性的避險策略創造出空間。

當國際社會存在成兩大不同意識形態集團激烈對抗時，國家運用彈性避險外交的機會就會減少。從冷戰時期的情勢發展看來，兩大不同意識形態集團之間，除了政治上相互競爭對抗以外，經濟上也很少與敵對陣營往來。加入聯盟體系的中小型國家，不管是側翼或同盟國，聯盟主導國在經貿上只允許該國與自己陣營的盟友進行貿易。然而，在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抗較不明顯的國際社會，採用避險的國家將有更多機會在政治安全上靠向某個強權，在經貿領域則與另一個強權合作。反之，若因為明確的意識形態對抗，國家較難將政治與經貿議題分開考量。以上闡述有別於過去對避險動機的研究。學界以往的研究主要考量國家層次的因素對於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影響。接下來將探討當國家面對「國際體系」層次的變化時，是否更有利避險，試圖擴展學界對於國家避險行為的討論。

三、體系層次與意識形態

國際關係學界對於「避險」的相關論述，多從「國家層次」分析各國避險行為。主要研究架構先從區分避險與抗衡或扈從之差別，進而推斷出避險的主要定義與構成要件。之後再進一步將此概念套用在個別或多個國家，進行相關時間序列分析。然而，這類型研究著重個別國家避險差異，以「國家層次」形塑避險相關理論事證。

學界對於從體系層次（system level）研究避險的成果相對較少。體系層次主要討論何種國際結構較適合國家採用避險策略。首先，在單極體系（unipolar system）中，非強權國家較容易採用避險。因為體系中的霸權具有極大的權力優勢，遠超過其他大國，當其他大國個別或聯合起來都可能無法擊敗霸權時，就會避免挑釁制衡霸權，考慮採取偏向扈從或避險的生存戰略。1990年代中國經濟起飛時，中國對美國的政策主要以避險為主（Medeiros

2005)。其次，在雙極體系（bipolar system）下，國家較不容易採用避險。因為兩大強國會明確地要求其他國家表態支持或加入自己的陣營，次級國家較不容易維持中立態勢或避險措施。直到美蘇兩強對抗的局勢稍微緩解，自身陣營內部也出現分裂或不同反對聲音，才有了其他國家推動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以下簡稱：NAM）發展的空間。在多極體系（multipolar system）中，因為權力較為分散，幾個主要國家通常會依照情勢發展，動態制衡可能破壞體系平衡的崛起大國，國家/決策者可以針對其他大國較為自由地選擇不同的外交政策或手段，並不見得一定要在兩大強權中選邊或同時交好（Koga 2018, 7）。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傾向並不明顯。

在意識型態與避險的討論上，我們了解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長期以來都在所謂的「疑慮的氛圍」中進行互動。依據民主國家之見，非民主國家總是對自己的人民抱持敵意。民主國家認為非民主國家正當性薄弱，其統治也是在高壓與強迫下進行。意識形態因此成為驅動外交政策主要因素（趙建民、許志嘉 2009）。然而，樂觀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的成長，不久將把中國帶往自由民主的軌道。然而，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再加上不必要的猜疑和輕率的判斷，更使得美中關係日漸複雜。就美國而言，早期對中國政策目標是希望促其政體改變，推動威權主義中國朝自由民主的政治方向發展。但經過多年來的實踐，中國非但沒有依照美國提供的劇本進行政治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反而展現出越來越強勢的風格（Christensen 2011; He and Feng 2012）。隨著中國崛起對外投射政治影響力，美國也因此跟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科技、貿易等各領域相互競爭（Friedberg 2011）。

意識形態相似有助於國家之間發展合作關係。因為相同政治體制或相似意識形態的國家更容易成為朋友，不同政治體制或有意識形態差異的國家則容易成為敵人。瓦特舉兩次世界大戰澳洲皆對德國宣戰為例，認為德國對澳洲沒有造成直接威脅，但因為澳洲效忠大英帝國，因此對盟友邀約必須做出參戰的決定（Walt 1987, 35）。這就是意識形態對國家結盟行為的影響，意識形態本身就決定了敵友的身份差異。

由於中國採取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若是放棄「不結盟」政策，改為透過建立聯盟關係來擴展自身安全與影響力，則亞太地區的民主國

家將會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增加了是否要加入其陣營的考量，日後也會因此而影響彼此信任的程度。⁵ 目前國際社會並未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形成明顯對立的不同陣營，因此中國的「不結盟」立場以及不強迫其他國家選邊的「夥伴關係」政策，就容易引發其他國家的外交傾向既不偏向傳統的抗衡，也不需要被迫扈從中國，反倒促成了周邊國家考慮採取避險戰略，使其能更靈活的採用中庸路線。中國自從1960年代以來鮮少結交盟國，在1990年代開始則運用「夥伴關係」的建立來拉攏其他國家。冷戰結束後，中國再度遇到建立邦交和復交的高峰。1991年中國恢復了與越南的友好關係和印尼的外交關係，1992年和南韓、新加坡、汶萊建交，與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ASEAN）建立了長期睦鄰互信夥伴關係，還分別和印度、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簽署了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等協定。為了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戒心和疑慮，江澤民也多次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一個穩定、發展和強盛的中國，不會對任何國家造成威脅，只會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洪停杓、張植榮 2004, 283-284）。因而在冷戰甫結束的199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以「夥伴關係」擴展對外交往，但是並未試圖建立自己的聯盟體系，因此為其他中小型國家的避險戰略創造出得以運作的空間。

本研究從避險之定義、動機與構成要件開始闡述，並根據「體系層次」中「意識形態」相關討論建立理論框架。主要探討當前國際體系是否有明顯之意識型態對抗。若缺乏明顯意識型態對抗時，中小型國家較容易採取避險戰略；反之，若以美中兩強為首的意識型態對抗強烈，則中小型國家較難維持避險。其次，在實證部分將以南韓為例，採用單一個案研究法（Babbie 2007, 298;

⁵ 本文並未認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就不會形成聯盟。根據瓦特研究指出，國家為了制衡共同威脅而形成聯盟的動力，高於意識形態相似而形成聯盟（Walt 1987, 37）因而美國在1940年代還願意跟蘇聯共產主義國家合作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軸心國家。此外，也有學者指出，美國冷戰期間選擇盟國主要是基於地緣戰略上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考量，因而並未排斥與當時亞太地區的威權國家建立聯盟關係（Cha 2016）。

McKeown 2004, 146; Rogowski 2004, 77-79) 探討南韓在美韓聯盟體系之下,⁶ 面對中國發展「夥伴關係」的吸引, 是否在時間軸上展現出避險之相關特質。簡言之, 本文欲藉由中國對南韓發展「夥伴關係」的歷程, 探討驗證南韓在美韓聯盟架構下的外交政策取向變化是否符合避險戰略的特質。

雖然美中兩強近年來在許多議題上相互角力, 但是尚未升級至冷戰時期漢賊不兩立的意識形態激烈對抗。因此, 許多中小型國家仍有機會採取雙邊套利的避險行爲。筆者認爲, 這點也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的外交政策特色有所關聯。⁷ 正是因爲中國透過「夥伴關係」拉攏特定國家, 但是並未強迫對方選邊, 亞太國家才得以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避險。也有學者觀察到, 除了南北韓之間基於歷史因素造成的持續敵對以外, 長期的制衡或扞從行爲其實在亞太地區並不常見 (Jackson 2014, 333)。下一節將論述中國對周邊國家發展「夥伴關係」的政治意涵, 並將選取南韓作爲個案說明, 即便是美國的亞太盟國, 在國際體系尚未達到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強烈對立的背景下, 將可能選擇避險戰略。⁸

⁶ 在理論建立的過程中, 採取單一個案在研究方法上仍有其效用與目的性。羅格斯基 (Ronald Rogowski) 提出比較政治學者李帕特 (Arend Lijphart) 探討荷蘭在缺乏「交叉分歧」 (cross-cutting cleavages) 下, 透過協和式民主也使高度異質性的體制達成政治穩定 (Rogowski 2004)。另外, 麥可文 (Timothy McKeown) 指出哈佛政治學者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於1970年代以古巴飛彈危機案例, 探討國家是否爲單一行為體 (McKeown 2004), 來形塑其理論論證。

⁷ 如果中國以強化自身安全爲導向, 放棄「不結盟」政策立場, 改爲建立聯盟關係, 則中美兩國就可能在爭取盟國上相互競爭對抗, 最後造成彼此的安全困境。此時小國即喪失雙邊套利的避險契機。

⁸ 關於中國何時採取較爲強勢的外交政策, 使得美中對抗開始白熱化, 對於其他國家又有何影響, 值得另以專文討論。爲了避免議題失焦, 本文在此暫不深入說明。雖然鄭必堅於2005年在《國際事務》期刊發表有關「中國和平崛起」論文, 但是中國官方後來則定調爲「和平發展」而非「和平崛起」。西方學界的研究也指出, 中國於江朱與胡溫體系下, 仍然採取較爲保守的維持現狀外交政策而非改變現狀 (Johnston 2003; Chan 2008; Kastner 2012)。沈大偉在《中國走向全球》 (China Goes Global) 書中亦強調, 直至2012年爲止, 中國在全球不同議題領域中, 仍僅具有「部分強權」 (partial power) 的功能 (Shambaugh 2012, 309-311)。在習近平上台後, 於2013年提出了「帶路倡議」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北京更積極參與全球事務, 也顯示出中國外交政策上的轉變。但是美中之間尚未出現冷戰時期因爲意識形態歧異而壁壘分明的敵對態勢。

參、「夥伴關係」之政治意涵

事實上，運用「夥伴關係」來界定國家之間的親疏互動並非由中國首創。在冷戰期間的美蘇長期對峙以後，蘇聯於1991年12月正式解體，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 Bush）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遂於1992年2月在美國大衛營簽署了聯合宣言，同意不再相互視為潛在敵人，兩國未來的關係將建立在互信、尊重和共同承諾追求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朋友關係和夥伴關係之上（eNotes.com 1992）。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ATO）於1994年1月在布魯塞爾召開蘇聯解體後的第一次高峰會議時，也提出過《和平夥伴架構文件》（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針對以往在蘇聯共產主義陣營的中、東歐國家發展外交關係展開討論。北約當時希望透過「和平夥伴計畫」，針對國防相關議題，以對話的方式強化歐洲地區的安定與安全，並擴及到政治與經濟領域（NATO 1994）。

王巧榮認為，1990年代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是一種新型態的外交關係，與冷戰時期的集團外交、勢力範圍外交、霸權外交並不相同，而且具有若干特點：一、以合作為目的的外交；二、夥伴關係是一種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關係；三、夥伴關係是一種平等互利的合作關係；四、夥伴關係通常設有協調或保障機制；五、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是一種戰略性外交（王巧榮 2006, 56-57）。中國會依據對外關係的進展而調整對特定國家的夥伴關係名稱。根據南韓學者李昌衡（2012）的觀點，中國的外交關係可以分成五個階段，即單純外交關係、睦鄰友好關係、夥伴關係、傳統友好關係、血盟關係。其中夥伴關係包含戰略性、建設性、全面性和合作性四種。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用於非常親密的兩國關係，這種關係的特徵在於兩國在各方面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並在國際、區域性問題上保持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南韓來說，自從1992年與中國建交以來，雙方關係就由友好合作關係（1992年）、面向21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1998年）、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3年），發展到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2013年6月，南韓總統朴槿惠（Park Geun Hye）訪問中國，雙方又共同發表了《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和《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行動計劃》。⁹ 蘇浩則指出，中國所建立的「夥伴關係」固然可以大致分為戰略層次、地區層次、雙邊層次和友好合作關係等四個層次，構成了中國外交較為完整的對外關係架構。但對這種「夥伴關係」架構做出不同層次的分析，並不意味著中國與不同國家間關係的遠近親疏，或是重要與不重要的區別，而是說明這些夥伴關係在功能上發揮不同的作用（蘇浩 2000, 11-12）。然而，即便是中國學者之間對於中國夥伴關係戰略的理論內涵也未能取得普遍共識，中國外交部更未公開說明不同夥伴關係國家頭銜在實務上的等級差異。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門洪華在梳理文獻以後指出，中國的夥伴關係戰略存在若干問題，包括：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確、層次不分明等。學者們對於夥伴關係戰略也有著認識上的差異（門洪華、劉笑陽 2015, 67）。整體而言，中國夥伴關係戰略更強調與傳統軍事聯盟的差異。

有學者將傳統軍事聯盟界定為「國家之間為了安全或擴大成員以對抗其他特定國家，決定是否要使用武力的正式結合，不論其是否被清楚地界定出來」（Snyder 1990, 104-105）。瓦特原先將聯盟簡單界定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並假定成員之間有不同程度的承諾與利益交換，而破壞這樣的關係或無法實現承諾將會有所損失（Walt 1987, 1, 12）。後來又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補充說明，將聯盟視為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不論正式與否的安全合作承諾，目的是要增強每個成員的權力、安全和（或）影響力。雖然每個聯盟的設計都不太一致，但是一個有意義的聯盟最主要的本質就是成員承諾要互相支持以對抗外部行為者（Walt 2009, 86）。由此可見，中國「夥伴關係」與傳統軍事聯盟最大的差別即在於，前者並未預設針對防範的特定目標國家，也並未以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差異來劃分敵我不同陣營，因此並未排斥向競爭對手或對手的盟國發展夥伴關係。¹⁰

⁹ 兩份文件詳細內容可以參見新華網的報導（2013a; 2013b）。

¹⁰ 過去學界對夥伴關係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方面論述頗豐。首先，西方學界對於夥伴關係的研究首重於與聯盟理論之比較。學者認為，夥伴關係與聯盟最大的不同點，不僅僅聚焦在安全層面（Wilkins 2011; Evall and Hall 2016），更具有對於價值與文化認同之意涵（Chidley 2014）。在討論中國的夥伴關係上，史楚佛（Gerg Struver）實證研究指出，中國與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相似度，不僅受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之影響，也與其他國家經濟或軍事有相關性（Struver 2016）。這些因素更直接影響中國夥伴關係之建

當江澤民於1997年10月赴美訪問時，中美雙方就簽署了《中美聯合聲明》，決定加強合作對付國際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新華網 1997）。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訪問中國。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指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這種夥伴關係有別於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是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其基本特徵是要發展友好，不搞對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異；不針對第三國（人民日報 1998）。但隨著國際局勢發展，到了2000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上任之初，美國則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Shambaugh 2000）。

在歷經了2001年阿富汗反恐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財力消耗，以及2008年國內的金融風暴衝擊後，美國又調整了對於中國的戰略評估。2005年時，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便曾表示，希望中國能成爲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2005）。後來還有學者曾以「中美國」（Chimerica）的新詞彙來強調雙方對於國際事務具有共同的影響力（Ferguson and Schularickz 2007）。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上任以後，又提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戰略，強調美國未來會在亞太地區投入大量的外交、經濟、戰略資源。在根據新的需求調整美國的亞太聯盟體系時，也將透過新的夥伴關係來解決共同面對的挑戰（Clinton 2011）。美國透過強化對亞太盟國的合作關係，雖然沒有明指中國，但是根據相關戰略規劃來說，一方面可以繼續維持自身領導地位，二方面將可在不增加過度財政負擔的情況下有助於圍堵中國（洪銘德 2015）。在此背景下，中國爲了避免中美之間的對立情勢升高，強調大國之間並不必然會發生衝突，開始將中美關係界定爲「新型大國關係」。¹¹ 美

立。簡言之，在後冷戰時期，中國透過夥伴關係與世界各國交往，主要是受到追求經濟目標與意識形態存在差異的影響（Struver 2017）。此外，李泉與葉明的研究中亦表示，中國發展不同類型的夥伴關係，主要受到三大因素影響：美國的壓力、中國對於週邊區域和平穩定的要求，以及追求經濟成長的現代化目標（Li and Ye 2019）。

¹¹ 因受篇幅限制且爲避免主題偏離，本文在此僅爲簡述中美於199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以來，兩國對於雙邊關係的觀感。有關「新型大國關係」的實質內容，以及中美雙方官員與學者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評價，可以參見其他學

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上任之初，原本美中關係尚稱穩定。國務卿提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於2017年3月訪問中國時，還以習近平提出的「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倡議中美兩國未來五十年的相處之道（Perlez 2017）。然而，在2017年底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川普政府則明確指出，美國國家安全的三大主要挑戰包括：中國與俄羅斯這些「改變現狀型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伊朗和北韓等「流氓國家」（rouge states），以及恐怖份子團體等跨國威脅組織（The White House 2017）。此時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競爭全球領導地位的對手。

若從經濟實力來比較，2020年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經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後，中國排名第一，約為24.27兆國際元，美國排名第二，約為20.94兆國際元。兩國都高於第三至五名的印度、日本與德國之總和（World Bank 2021）。¹² 在軍事費用開支方面，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SIPRI）的資料顯示，美國為2020年全球軍費支出最多的國家，約為7780億美元，佔全球39%，排名第二的是中國，約為2520億美元，佔全球13%。兩國皆遙遙領先第三至五名的印度（729億美元，3.7%）、俄羅斯（617億美元，3.1%）、英國（592億美元，3.0%）（Silva, Tian, and Marksteiner 2021）。由此可見美國與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雄厚。

有學者認為，中國成立的戰略夥伴關係，是要和那些對於促進更加「多極化」的國際環境有著共同利益的國家建立關係，明顯是要和美國權力做出對比（Eisenman et al. 2007, 16）。然而，此番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何中國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還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日本、南韓與澳洲，以及美國在歐洲地區的盟國—英國、法國與德國，甚至包括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夥伴關係。門洪華認為，1989-2001年期間，同時出現了世界轉型和中國崛起，西方大國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呈現出更複雜的特

者的分析（楊仕樂 2015；蔡明彥、張凱銘 2015；王浩 2014；Wu 2014；Denmark 2013）。

¹² 1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即等於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

徵。大致上來說，大國注重拓展全方位大國外交，即使保持傳統聯盟的國家，也積極尋求與非盟國建立某種「夥伴關係」，建構有利於本國戰略利益而又相對平衡的大國關係（門洪華 2013, 77）。對於中國來說，「戰略夥伴關係」並不同於（準）軍事聯盟關係，因為後者還涉及到廣泛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在中國的外交政策詞彙中，夥伴關係被視為具有戰略性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該關係具有綜合性，包含了所有層面的雙邊關係（例如：經濟、文化、政治和安全）；二、兩國同意針對雙邊關係做出長期承諾，雙邊問題將會在此脈絡下受到評估。重要的是，偶發的緊張情勢並不會使雙方偏離原有合作方向（Medeiros 2009, 82）。

在鄧小平掌權的1980年代期間，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戰略保持低調，持續主張「不當頭、不稱霸、不結盟」的立場，並未訴求積極擴張或改變現狀，也未爭取建立或參與其他聯盟體系。¹³ 1984年5月，鄧小平則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中國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1993, 56-57）。到了江澤民時期，他在1998年8月的駐外使節會議上則強調，「要繼續長期堅持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要韜光養晦，收斂鋒芒，保存自己，徐圖發展。我國國情與國際力量對比決定了我們必須這樣做。」（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2006, 202）。在胡錦濤執政期間，雖然上海合作組織已經開始運作，但其在2006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強調，該組織是以開放、不結盟的原則，向各國宣導新安全觀，並不是一個封閉性、排他性的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大使館 2006）。雖然上海合作組織近年來持續擴展，但是仍然並未強調針對特定國家。

¹³ 1982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Javier Perez de Cuellar）時表示，「很多朋友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我們說，頭頭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的名譽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譽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1994, 416）。

肆、南韓在美中之間的抉擇

本文將挑選南韓並檢視其在中美兩大強權之間的政策變化，是否符合避險戰略的理論預期。選擇南韓的原因在於：一、南韓在1953年成為美國的軍事盟國，對於在冷戰期間圍堵共產主義擴張，以及嚇阻北韓發動軍事攻擊發揮了安全上的功能。二、南韓於1992年8月24日轉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國經貿關係逐步發展，其後中國分別在2003年超過美國，成為南韓最大的出口國，在2007年超過日本，成為南韓最大的進口國。南韓對中國的雙邊貿易額，在2014年已經達到2,354億美元，佔南韓該年度整體對外貿易的21.4%，甚至超過了南韓對美國貿易（1,156億美元）與對日本貿易（860億美元）的總和（Chung 2015, 10）。在2020年時，南韓對中國出口金額約為1,326億美元，是南韓對第二大出口國—美國（742億美元）的1.79倍。南韓對中國進口金額約為1,089億美元，是南韓對第二大進口國—美國（575億美元）的1.89倍。三、自從巴西於1993年11月成為中國第一個夥伴關係國家開始（趙重陽 2014），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延續「不結盟」的外交立場，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來改善雙邊或多邊關係交往。中國與南韓則是於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四、冷戰結束以後，南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美國在1999年度的《國防報告》（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指出，隨著21世紀的到來，美國面臨著一個充滿變化又不確定的安全環境。雖然爆發全球戰爭的可能性降低，但是仍然有大規模的越境侵略、潛在的危險科技、跨國危機、對美國本土的威脅、失敗國家等問題造成美國國家安全的挑戰。包括北約、日本與南韓在內的盟國，對於美國的安全一直至關重要，也成功地轉型以面對今日的挑戰（Cohen 1999, 1-3）。

南韓與美國建立聯盟關係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防範與嚇阻北韓的軍事入侵。但是美國做為「共同圍堵者」（co-container），一方面要提供安全與穩定的環境讓南韓發展經濟抵抗北韓，另一方面則對於兩韓未來的政治發展有著自身國家利益考量。當南韓總統金大中（Kim Dae Jung）為了改善兩韓關係而於1998年提出「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時，就與當時美國對北韓強硬的政策態度不同（Cha 2003, 279-281）。南韓與美國對於朝鮮半島的

未來發展期待存在若干分歧，這種情緒也延續到後來雙方政府。根據康燦雄（David C. Kang）彙整的資料顯示，在盧武炫（Roh Moo Hyun）總統任內，南韓與美國關係較為疏遠，有若干美國學者也質疑美韓聯盟是否出現裂痕。史奈德（Scott Snyder）就認為，美韓聯盟在此時期的發展對於兩國來說，重要性明顯不如冷戰時期。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下簡稱：AEI）研究員艾伯史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則是將南韓稱為「失控的盟國」（a runaway ally）。甚至還有其他學者建議美韓聯盟應該要解散（Kang 2005, 116）。

雖然南韓已經於1994年從美國手上取得了部隊在和平時期的指揮權。2006年10月，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與南韓國防部長尹光雄（Yoon Kwang Ung）原本同意南韓部隊的「戰爭時期作戰指揮權」（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應該要在2009年10月至2012年3月間從美國轉移給南韓。但是盧武炫總統卻在2007年就向美國提出要求，他希望藉此克服南韓對於美國的心理依賴來恢復國家主權與尊嚴感。後來因為北韓的核武試爆與外交挑釁，¹⁴ 美韓聯盟之間的作戰指揮權轉移才一再拖延。在2021年3月底美韓外交與國防官員的會談中，雙方達成共識，要視彼此因應國際情勢的準備程度來決定何時轉移指揮權。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薩波（John Supple）表示，對於轉移的日期做出明確期限只會增加美韓聯盟部隊的風險（ISDP 2021）。

作為美國的重要亞太盟國，南韓固然依賴美國安全保障，但是由於後冷戰時期共產陣營勢力大幅削弱，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降低（Mueller 1989），許多國家在外交政策中轉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考量。南韓正是在此背景下，於1992年轉向中國建立正式邦交，此後兩國的雙邊關係逐步改善，中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安全議題也有越來越多的發言權（Bong 2017, 49-57）。因此，南韓與美國之間雖然偶有部分意見齟齬，但是基本上仍然維持了聯盟關係穩定。中國試圖透過「夥伴關係」的提升來拉攏南韓，也使得南韓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有了更多的政策揮灑空間（Chung 2007），極適合作為本文

¹⁴ 自從北韓於2009年5月25日進行第2次核子試爆以後，又多次進行彈道飛彈與核武測試（Davenport 2020）。

的案例加以檢驗。南韓與中國建交後的外交關係變化大致情況如下：

一、睦鄰合作關係：在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建立邦交而簽署的聯合公報中，雙方同意根據《聯合國憲章》，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持久的睦鄰合作關係；中國則表示「尊重朝鮮民族早日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願望，並支持由朝鮮民族自己來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0）。

二、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金大中於1998年11月訪問中國，根據《中韓聯合公報》指出，雙方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中韓建交公報的精神，在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基礎上，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中國網1998）。

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盧武鉉於2003年7月初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兩國同意以聯合國憲章原則、中韓建交聯合公報精神以及業已存在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基礎，建立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此外，雙方認為，擴大和深化兩國經貿合作，符合共同利益，有利於兩國的共同發展。同意成立聯合小組研究雙邊經貿合作規劃，也同意採取積極措施，推動兩國貿易的健康、順利發展，共同努力改善貿易不平衡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3）。

四、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5月下旬，南韓總統李明博訪問中國大陸。雙方高度評價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的迅速發展，並一致同意將「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外交、安全、經濟、社會、文化、人員交流等各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此外，雙方也認為，中韓合作是推進六方會談和朝鮮半島非核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同意為實現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繼續緊密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五、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6月下旬，韓國總統朴槿惠訪問中國大陸。在雙方所發表的《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中指出，應該在互信的基礎上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推進以下三個領域合作：（一）加強政治安全領域戰略溝通。兩國領導人密切溝通，全方位、多層次推進兩國政府、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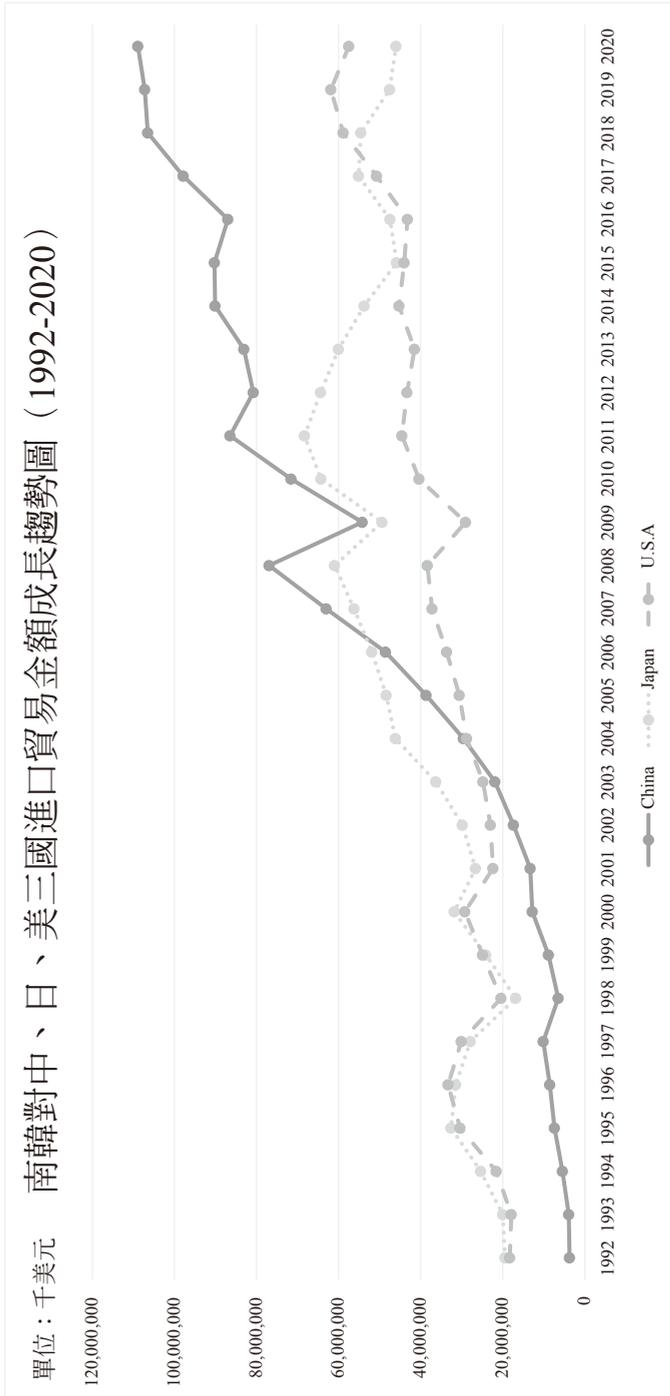
會、政黨、學術界等多種主體間的戰略溝通，進一步提高戰略互信；（二）進一步擴大經濟、社會領域合作。雙方再次確認，中國與韓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應是一個包含實質性自由化、廣泛領域的高水準、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三）促進兩國國民間多種形式交流，進一步促進兩國公共外交領域的合作和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3）。2014年7月，習近平前往南韓訪問。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中韓作為東北亞地區的重要近鄰和夥伴，為成為實現共同發展的夥伴、致力地區和平的夥伴、攜手振興亞洲的夥伴、促進世界繁榮的夥伴，將以《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和本《聯合聲明》為基礎，推動兩國關係今後朝以下方向發展：（一）兩國政府以互信為基礎，構建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為增進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加強合作；（二）兩國通過攜手創新，擴大面向未來的戰略性經貿和產業合作，共同致力於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復甦，為地區及世界經濟增長發揮引領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4）。

在冷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意識形態對抗趨緩的背景下，像南韓這樣的非強權國家反倒可以在對外關係上更多考慮自身利益，調整外交政策作為，而非僅以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作為評判交往對象的標準。南韓自從1992年與中國建交以後，除了政治外交關係逐漸改善以外，根據韓國統計資料中心（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以下簡稱：KOSIS）的數據顯示，¹⁵以往美國與日本向來是南韓主要的貿易夥伴。但是在中國與南韓建交以後，中國分別在2003年超過美國，成為南韓最大的出口國，在2007年超過日本，成為南韓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對南韓的進口與出口金額除了1998、2001、2009、2012、2014、2015、2016、2019年略有下降以外，幾乎是連年攀升。

根據南韓學者辛星昊（Sheen Seong Ho）2003年發表的報告指出，1992至2002年期間，韓中之間的貿易量是以平均每年超過20%的速度成長。南韓企業在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中看到了機會，這也使得南韓出口導向的經濟更依賴中國。這種經濟利益也成為南韓追求對中國穩固夥伴關係的主要動力。盧武炫在2003年7月訪問中國時甚至表示，東北亞的時代即將來臨，而在舞臺中央的正

¹⁵ 以下數據皆彙整自：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2021)，請見圖1與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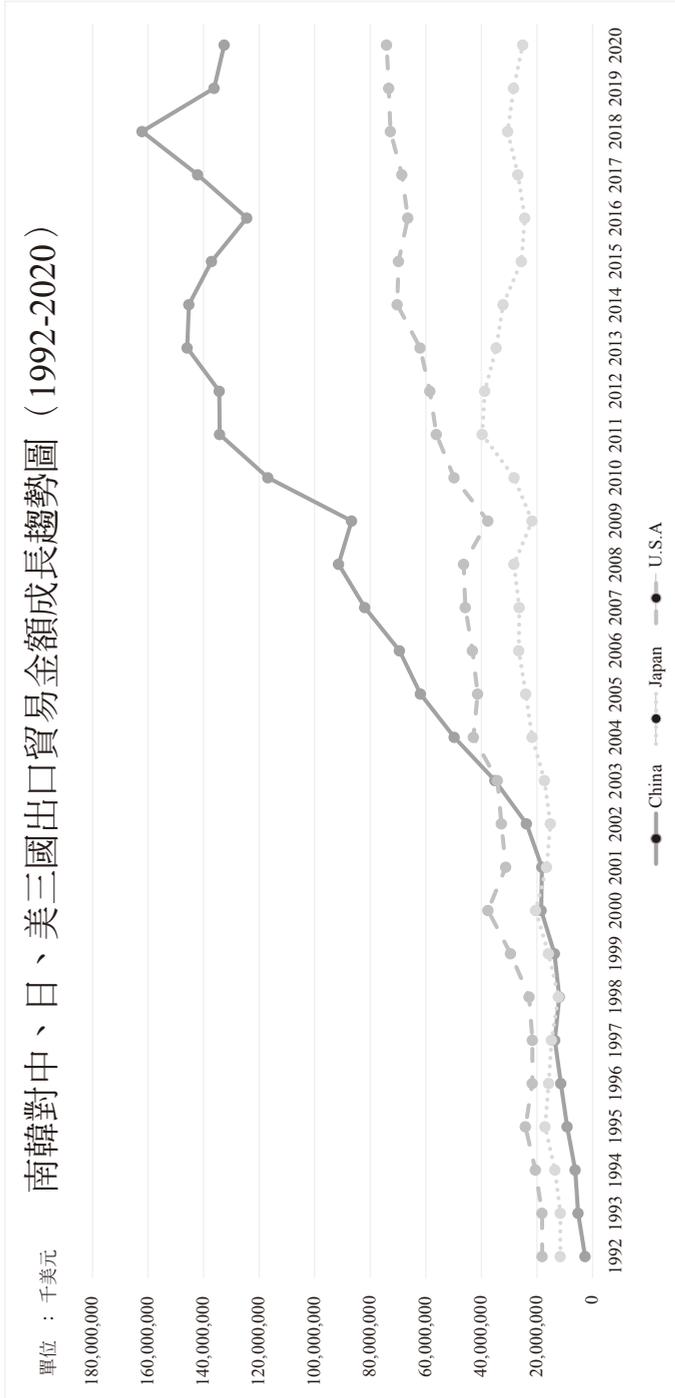
圖1 南韓對中、日、美三國進口貿易金額成長趨勢圖 (199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數據來自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2021)，[https://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360&tblId=](https://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360&tblId=DT_1R11006_FRM101&language=en&conn_path=I3)

DT_1R11006_FRM101&language=en&conn_path=I3。

圖2 南韓對中、日、美三國出口貿易金額成長趨勢圖（1992-202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數據來自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2021) , [https://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360&tblId=](https://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360&tblId=DT_1R11006_FRM101&language=en&conn_path=13)

DT_1R11006_FRM101&language=en&conn_path=13。

是中國與南韓（Sheen 2003, 2-4）。由於盧武炫延續了前任金大中政府對北韓的「陽光政策」，不但持續和中國合作對北韓提供無條件的經濟援助，也在民間激起反美情緒。這就使得美國無法對北韓運用有效的軟硬兼施戰略促其遵守六方會談有關解除核子能力的決定（Han 2008, 341）。在此一時期，中國透過「夥伴關係」的發展與經濟手段的運用，影響了南韓的外交政策趨向，使其略微偏離了美國的預期而轉向中國尋求合作。美國學者奧弗霍特（William Overholt）認為，南韓仍然有許多槓桿操作的機會，不見得要在美中兩強競爭之間選邊。中國如果想要跟日本競爭，就離不開南韓的支持。不過如果南韓要尋求南北韓的統一與處理朝鮮半島安全議題，則需要中國的協助。但是保持對美國的穩固關係才會在避險中國時發揮作用（The Korea Times 2011）。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也表示，南韓在軍事上並沒有將中國視為潛在威脅，在經貿上則是對中國依賴，民衆對於中國崛起其實抱持開放接受的態度。因此，南韓與美國維持聯盟關係，目的並不是要制衡中國崛起，南韓對中國其實採取的是順應調適（accommodate）的戰略（Kang 2009）。

在安全領域方面，原先南韓還在猶豫是否要加入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甚至在2012年10月下旬，南韓國防部一度表示，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為多層防禦體系，可以分成上層、中層和低層，感知範圍可達2000公里以上。南韓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主要是感知和識別來自北韓的彈道，在低層（40公里以下）進行射擊，感知範圍也只有500-1000公里。因而南韓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KAMD）與美國的全球彈道飛彈防禦系統（MD）完全不同，更否認了南韓要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反彈道飛彈聯盟的說法（鍾永和 2018）。2014年5月29日，南韓國防部發言人金珉奭（Kim Min-Seok）更強調，不會加入美國主導的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主要原因在於，美國採用的是用於高空攔截的末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而韓國自主研發的系統則是用於低空攔截（新華網 2014）。

然而，當北韓在2016年間先後進行核子試爆與彈道飛彈測試，引發南韓安全顧慮時，南韓還是轉向了美國尋求較為直接的安全保護，但是也極力維持對中國的雙邊關係。2016年1月6日，北韓進行第4次地下核子試爆。當時北韓媒體還宣稱，這不但是為了保護國家主權，更是讓自身免於受到美國核子威脅的

自我防衛措施（Daily Record 2016）。3月9日，北韓更進一步宣布可裝載在彈道飛彈上的核彈頭已微型化成功。其後又進行了洲際彈道飛彈的熱防護罩、火箭發射與固態燃料測試，美國戰略司令部評估，北韓可能已經發展出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技術（McLaughlin 2018）。

在此背景之下，美國在2016年2月初便正式向南韓提及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以下簡稱：THAAD），經過多次諮商，朴槿惠政府在同年7月7日公開宣布決定部署（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17）。美韓兩國在聯合聲明指出，此舉是爲了確保南韓及其民衆的安全，並保護聯盟部隊不會受到北韓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彈道飛彈的威脅而採取的防禦性措施。此外，雙方也強調，部署在朝鮮半島的「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只是用來對付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威脅，而不會針對任何第三國（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2016）。

然而，中方卻認爲南韓同意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具有將中國視爲安全威脅的意涵。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7月下旬就曾表示，南韓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不只是個技術議題，還是個戰略議題。南韓此舉傷害了兩國之間的信任。雖然南韓外交部長尹炳世（Yun Byung Se）回應強調，部署該系統是爲了保護南韓的安全，並不會傷害中國的安全利益（Kim et al. 2016）。但是仍然引發了中國官方的抗議與檯面下的排擠。雖然曾有媒體在2016年11月21日中國外交部記者會提問，中國政府是否透過「限韓令」要求各電視台不得播出南韓明星代言的廣告。但是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當時表示，中國並沒有推出「限韓令」，不過他也強調「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這一立場也是衆所周知的。中國民衆也對此表達了不滿，相信有關方面應該注意到了這種情緒。」（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6）

2017年7月3日至8日，習近平前往德國出席G20領袖第12次峰會時，首次與南韓總統會晤。習近平先是強調，對於文在寅（Moon Jae In）總統派遣韓國代表團出席5月中旬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表達改善和發展中韓關係、妥善處理敏感問題的積極意願」表示肯定。中方願意運用兩國建交25周年的契機，推動中韓關係早日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文在寅則回應表示，韓中兩國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已經成爲重要的合作夥伴。

韓方也願意跟中國一起加強高層往來與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將兩國關係塑造成實質性戰略夥伴關係（央廣網 2017）。

在經過中韓雙方多次的磋商以後，中國外交部在2017年10月31日發表聲明指出，韓方認識到中國在薩德問題上的立場與關切，也告知中方部署該系統的目的不會針對第三國，不會損害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中方也重申反對南韓部署薩德系統的立場。雙方同意透過軍方管道，對於中國關注的薩德系統議題進行溝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a）。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同日起在新聞記者會上也表示，韓方告知不會加入美國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不會將韓美日安全合作發展成三方軍事聯盟，不會追加部署薩德系統。妥善處理薩德議題與掃除兩國發展關係的障礙，既符合雙方的共同意願，也符合共同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b）。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2017年11月22日在北京與南韓外交部長康京和（Kang Kyung Wha）會談時表示，「中方重視韓方關於不考慮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的表態以及無意損害中方安全利益的表態，希望韓方繼續妥善處理『薩德』問題。中韓雙方應共同努力，進一步增進相互瞭解，最大限度減少分歧，為兩國關係全面恢復發展創造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c）至此，南韓因為引入美國「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而造成的韓中關係倒退，暫時告一段落。2017年12月13日至16日，南韓總統文在寅更率領數百位企業高層，一起前往中國訪問洽談商業合作機會，試圖修補因為薩德問題而受影響的韓中關係（Clover and Harris 2017）。

綜觀中國與南韓雙邊關係緩和的可能因素在於：從中國的立場來說，可以趁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輕忽盟國重要性之際，拉攏南韓以分化破壞美國與南韓關係，尤其是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更需要增加朋友、減少對手（Kim 2019）。中國甚至可能想要進一步主導朝鮮半島議題，設法抵抗、減少或排除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維持現狀並促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符合中國戰略利益（Wang 2018）；從南韓的立場來說，由於北韓對中國依賴甚深，特別是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北韓試爆核子武器而提出多次制裁以後。南韓需要

中國協助穩定朝鮮半島局勢，¹⁶ 中韓兩國對於在北韓問題上加強合作以避免衝突發生，具有共同利益。此外，中國是南韓最大貿易夥伴，改善韓中關係可以強化雙方地緣經濟合作，參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增加對歐亞大陸經濟發展的機會（河凡植 2018, 31）。中韓自2012年由官方正式展開談判，並於2015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中韓雙方更積極在區域自由貿易與一體化上，促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簽訂；並期望藉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來作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前奏（人民網 2015）。也有學者觀察到，即便是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互賴關係，都使得前者比較不願意參與到針對中國的權力制衡，而南韓、日本與台灣等美國盟邦更是持續與中國交往。中國的經濟拉力可能鼓勵了周邊國家更多「中立」的安全政策，但是並不表示短期內會出現軍事平衡的激烈變化（Ciorciari 2009, 175）。

由此可見，在南韓感受到北韓的核武與彈道飛彈威脅時，仍然運用美國的盟國身份，向聯盟霸主尋求安全保護，也因此影響了對中國關係（Sankaran and Fearey 2017, 332）。2016年與2015年數據相比，南韓對日本與美國進出口貿易金額並未有明顯變動，但是對中國進出口貿易金額都出現明顯下滑，到了2017年才又繼續上漲。在南韓已經部署部分薩德系統以後，南韓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於2017年1月底發表的民調顯示，在2015至2017年初期間，南韓民衆認為韓中關係的競爭性約為69.8%~75.0%，遠高於兩國關係合作性的15.4%~20.0%。在2016年，有61.4%的受訪民衆認為，中國將會是未來的經濟霸權，只有31.5%的受訪民衆認為是美國。但是有59.4%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會是未來的政治霸權，只有32.5%的民衆認為是中國（Kim et al. 2017）。在朝鮮半島核武危機解除以後，南韓也恢復了對中國經貿友好關係，持續在美中兩大強國之間避險。這種政治上偏好美國，經濟上

¹⁶ 2018年元旦，金正恩透過「朝鮮中央廣播電臺」（Korean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tion）表示，為了改善目前處於凍結狀態的北南關係，北韓願意派出代表團參與南韓即將在平昌舉辦的冬季奧運（魏嘉瑀、蔡亦寧 2018）。2018-2019年期間，金正恩曾多次出訪外國，在外交會晤前後更是皆前往中國與習近平會面。

重視中國市場的外交策略，充分顯示南韓的外交政策具有明顯的避險特色。

美國總統川普在2017年1月上任以後訴求「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極力維護其認定的美國國家利益，動輒退出國際組織與協議，也開始對包括軍事盟國在內的不同國家施壓，要求增加共同防衛經費的分擔、縮短貿易逆差、針對特定產品課徵關稅等(Zakaria 2019; MacDonald 2018)。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以下簡稱: KORUS FTA)於2012年生效以後，美國對南韓貿易逆差成長更快。如果以2012年為分界點，2003至2011年美國對南韓貿易逆差平均約為137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2.44%。但是2012至2020年則成長至228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8.88%(The U.S. Census Bureau 2021)。川普認為，美國並沒有因為簽署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而獲得利益，因而要求南韓加以修改，兩國最終於2018年3月26日針對協定修正內容與南韓鋼鐵出口美國關稅減免達成共識。新版修正的內容包括：美國針對南韓卡車課徵25%關稅逐步消滅為零的期限，從2021年延後至2041年；美國汽車製造商每年向南韓出口符合美國安全標準而非南韓標準的汽車數量，從2萬5千輛擴展到5萬輛；南韓簽署鋼鐵附帶協議，取得每年268萬噸鋼鐵出口美國之配額，約為2015至2017年出口至美國數量的7成(劉芸昕 2018)。

由於川普對盟國施壓，也批評與退出若干國際制度，減損了南韓等盟國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可靠程度，這也促成了南韓對中國避險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就有南韓學者表示，包括南韓在內的亞洲中等國家之所以不願意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是因為其主要目標是想要軟化(tame)中國的外交作為，而不是加以圍堵。川普總統任內除了拉攏日本、印度、澳洲以外，無法再召集其他新成員的原因，主要就是美國似乎減弱了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的承諾，而正在崛起的中國則發展出更多的反對與處罰能力(Jung et al. 2021)。

另一方面，北韓由於發展核武與彈道飛彈試射而遭到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制裁(Davenport 2020)，朝鮮半島情勢也一度緊張。但是金正恩在2018年起出現態度轉變，並不排斥與外國元首會面商討朝鮮半島安全議題(Son 2021)。2018年3月6日，南韓國家安全室室長鄭義溶(Chung Eui Yong)率領的特使團從北韓返回後表示，南北韓雙方決定4月底將在邊境板門店的和平之家舉行史上第3次兩韓元首高峰會議。金正恩在會見南韓特使團時也表示，有意積極參

與美國的對話，可以將「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列入兩國對話議題（韓聯社 2018）。但是金正恩 2011 年掌權以來第一次出訪，就是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前往中國與習近平會晤，這也是金正恩第一次和外國元首會面（Myers and Perlez 2018）。

在 2018 至 2019 年間，金正恩多次出訪會見外國元首。雖然其分別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參與兩韓高峰會，2018 年 6 月 12 日參加第一次川金會，2019 年 2 月 28 日參加第二次川金會，2019 年 6 月 30 日參加第三次川金會。但是在這些會議前後，也都分別於 2018 年 5 月 8 日前往中國遼寧省大連市，2018 年 6 月 19 日前往中國北京市，2019 年 1 月 7 日再次前往中國北京市，2019 年 6 月 20 日在平壤與習近平會面。由此可見中國對於北韓的重要性，而南韓若欲追求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兩韓和解對話，勢必繞不開中國的角色，或者至少不能與中國決裂而失去支持。

有南韓學者觀察到，當中國對南韓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提升的時候，南韓也想要略微靠向中國以適當地對美國展現出追求自主的地位。尤其是在美國與北韓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南韓總統文在寅相信中國可以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因為薩德飛彈防禦系統的爭議出現，南韓的傳統軍事盟國—美國對於南韓靠向中國的政策感到不滿，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也因而在雙邊交流上予以抵制與杯葛。南韓必須要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關係中取得巧妙的平衡（Lee 2021）。

基於以上對南韓在美韓聯盟體系下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之論述，並套用本文對避險之定義，吾人可發現南韓得以成為避險概念的適當案例。康燦雄亦認為，面對中國過去積極崛起，在亞洲乃至於全球與美國分庭抗禮，南韓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很少在抗衡光譜之中（Kang 2007, 55）。相反地，南韓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有許多相似利益所在，例如共同面對北韓問題以及處理對日關係。在國際體系還未因意識型態分歧而涇渭分明之背景下，美國的盟國身份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合作對象，更是讓南韓可以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的一項利基。本文期望藉由選取南韓作為案例探討，對國家的避險戰略在理論與政策面向提出更深層的實證研究。

伍、結論

冷戰結束意味著美國與蘇聯各自領導不同陣營激烈對峙的兩極體系趨於緩和，雖然中國國力逐漸崛起，但是由於其自從1980年代以來就確立了「不結盟」的政治立場，1990年代開始則是透過「夥伴關係」對外加強與特定國家的友好合作，甚至也向美國及其盟國建立起不同等級的「夥伴關係」，並未訴求在軍事上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由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領導的聯盟體系缺少如同冷戰期間的具體對手，也間接緩和了東西方國家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然而，中國的高速崛起，是否會取代冷戰時期蘇聯的地位，塑造另一個「新冷戰國際體系」，目前仍不得而知。但亞太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卻可以利用目前國際社會缺乏明確意識形態對抗的機會，爭取自身利益，並避免被捲入大國之間衝突的泥淖。國際關係學者重視國家如何在無政府狀態下得以確保自身生存與安全，當國家在自身實力不足以擊敗對手時，如何低調而不挑釁刺激對手，在外交政策上保持彈性且游刃有餘，這便是中國周邊中小型國家採取避險策略的主要考量。

對中國來說，在總體實力仍不及美國和其主導的西方民主國家聯盟體系陣營的情況下，如果貿然放棄既有的「夥伴關係」及長期「不結盟」政策立場，大張旗鼓採取聯盟戰略，更有可能會因刺激周邊國家而遭到制衡圍堵，或引發激烈衝突，反倒不利於中國的生存利益，並不是基於理性考量的最佳策略。換言之，從重視國家生存的本性出發，與鄰近各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強迫周邊中小型國家選邊站，應該是北京政府當前的外交策略主軸。

在此情況下，中國透過「夥伴關係」戰略的實施，一方面在傳統外交關係之上持續擴展包括對美國及其盟國在內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也刻意與傳統軍事聯盟型態做出明顯區隔，強調並非針對特定目標，以降低美國與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威脅論」的刻板印象。除非國際情勢驟然發生劇烈變化，有利於中國透過聯合其他國家共同針對特定對手予以制衡攻擊，尋求亞太區域或全球霸權領導地位，否則短期之內中國應不至於放棄「夥伴關係」而改為建立聯盟。

若中國持續維持「夥伴關係」而非傳統上的軍事結盟，亞太國家將獲得喘息空間，並得以在美中兩國之間維持等距外交關係。簡言之，中國的「夥伴

關係」讓亞太國家經貿上能繼續與中國往來，但是在軍事上並不需要與中國結盟。對於亞太國家來說，貿然地傾向美中任何一方，並不會在國家安全與經濟上獲得最大利益。反之，可能因過度「扈從」某一強權，失去原本國家在軍事安全與經濟活動上的彈性。本研究有別於過去學界就「國家層次」探討避險，而從「體系層次」出發，試圖探討亞太中小型國家採取避險的主要原因，並以南韓為例說明此一避險戰略的可行性。理論上，若國際體系中兩強對抗情勢較為趨緩，沒有強迫中小型國家選邊站時，避險可能成為各國的外交政策選項之一。相反地，若體系中意識形態明顯分歧，小國將被迫選邊，則不容易選擇避險戰略。

中國採取「夥伴關係」外交給予了亞太國家在外交政策選擇上的體系層次誘因。對於中國而言，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可以改善對外關係，藉由經貿手段發揮政治影響力。對於亞太國家來說，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可以擴展對中國的商業機會，但是又不需要被迫只能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然而，當安全威脅或經濟利益受到傷害時，亞太國家還是會依照個別狀況做出評估取捨。

本研究採用單一國家案例，分析南韓在美韓聯盟與中國「夥伴關係」架構下，將政治安全與經濟利益分別投放在不同強權上的政治發展。本文也希望未來相關研究能繼續以國際體系中不同成因與面向，解釋更多不同亞太國家在面對美國與中國外交角力益發激烈的背景下，最適合採取的外交手段與戰略。

（收件：110年4月20日，接受：111年1月11日）

South Korea's Hedging Strateg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hi-An Che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enter of Kore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rles Chong-H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remained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hedging has become a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object for the secondary states in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partnership"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lack of a clear ideolo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its impacts on states' hedging. Due to the strategy of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 it has provided room for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hedging behavior. South Korea has represented one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hedging example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unles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not abandon its "partnership" strategy, which can explain why the risk aversion strategy is currently gaining more affirmation from the decision makers.

Keywords: hed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ROK relations, US-ROK relations, Asia Pacific

參考文獻

- 人民日報，1998，〈努力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6月18日。http://www.peopledaily.com.cn/9806/18/current/newfiles/a1010.html，查閱時間：2021/1/6。People's Daily. 1998. "Nuli jianli zhongmei jianshexing zhanlue huoban guanxi" [Dedicate to Build the Sino-U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June 18.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 人民網，2015，〈中日韓領導人齊聲促談三邊自貿協定〉，11月3日。http://money.people.com.cn/stock/n/2015/1103/c67815-27769535.html，查閱時間：2021/7/5。People. CN. 2015. "Zhong ri han lingdao ren qi sheng cu tan san bian zi mao xieding" [The Leaders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Unanimously Promote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November 3. (Accessed on July 5, 2021)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Editorial Committee on Party Literatur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 1993. *Deng Xiaoping Wenxuan, Di San Juan* [Deng Xiaoping's Collection, Volume II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199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Editorial Committee on Party Literatur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 1994. *Deng Xiaoping Wenxuan, Di Er Juan* [Deng Xiaoping's Collection, Volume II, 2nd Edi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2006，《江澤明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Editorial Committee on Party Literatur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 2006. *Jiang Zemin Wenxuan, Di Er Juan* [Jiang Zemin's Collection, Volume I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中國網，1998，〈中韓聯合公報〉，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8/24/

content_26327495.htm，查閱時間：2021/1/6。China Net. 1998. “Zhong han lianhe gongbao” [PRC-ROK Joint Communiqué].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0，〈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1207_676536/t5614.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e dahan minguo guanyu jianli waijiao guanxi de lianhe gongbao”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3，〈中韓聯合聲明〉，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57973.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3. “Zhong han lianhe shengming” [PRC-ROK Joint Statement].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中韓聯合聲明〉，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460923.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Zhong han lianhe shengming” [PRC-ROK Joint Statement].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1207_676536/t1053915.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Zhong han mianxiang weilai lianhe shengming” [PRC-ROK Joint Statement on Facing the Future].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中韓聯合聲明〉，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1207_676536/

t1171408.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Zhong han lianhe shengming" [PRC-ROK Joint Statement].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2016年11月21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17148.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2016nian 11yue 21ri wajiaobu fayanren gengshuang zhuchi lixing jizhehui"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Held a Routine Press Conference on November 21, 2016].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a，〈中韓雙方就中韓關係等進行溝通〉，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506044.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a. "Chunghan shuangfang chiu chunghankuan hsi têng chihhsing kou t'ung" [China Communicated with South Korea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b，〈2017年10月31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506202.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b. "2017nian 10yue 31r wajiaobu fayanren huachuening juchr lishing jijehuei" [Spokesperson of Chin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ua Chuen-ying Held a Routine Press Conference on 2017/10/31].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c，〈王毅同韓國外長康京和舉行會談〉，<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513135.shtml>，查閱時間：2021/1/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c. "Wangyi tong hanguo waizhang kangjinghe juhing huiyan" [Chin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Wangyi Held a Meeting with ROK'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Kyung-wha Kang].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大使館，2006，〈胡錦濤接受上合組織成

- 員國記者聯合採訪〉，<http://tj.china-embassy.org/chn/xwdt/t255728.htm>，查閱時間：2021/1/6。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2006. "Hujintao jieshou shanghezuzhi chengyuanguo jizhe lianhe caifang" [China's President Hujintao was Interviewed by the Journalist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 王巧榮，2006，〈論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53-61。Wang, Qiao-rong. 2006. "Lun 20 shiji 90 niandai zhongguo de huoban guanxi waijiao"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2: 53-61.
- 王浩，2014，〈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建：理論透視與歷史比較〉，《當代亞太》，5：51-75。Wang, hao. 2014. "Zhongmei xinxing daguo guanxi goujian: lilun toudi yu lishi bijiao"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5: 51-75.
- 央廣網，2017，〈習近平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http://china.cnr.cn/gdgg/20170706/t20170706_523837210.shtml，查閱時間：2021/7/4。China News Radio. 2017. "Xi jin ping hui jian han guo zong tong wen zai yi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with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Accessed on July 4, 2021).
- 朱立群，2009，〈中國外交的「中庸」特色〉，《外交評論》，3：18-22。Zhu, Li-qun. 2009. "Zhongguo waijiao de 'zhongyong' tese" [The Moderationism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Review*, 3: 18-22.
- 吳玉山，2009，〈權力不對稱與兩岸關係研究〉，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31-60，台北：五南。Wu, Yu-shan. 2009. "Quanli buduicheng yu liangan guanxi yanjiu" [The Power Asymmetry and Studie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Bao Zong-he and Wu. Yu-shan,

- eds., “*Chongxin jianshi zhengbian zhong de liangan guanxi lilun*” [*Revising Theori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pp. 31-60. Taipei: Wu Nan Inc.
- 吳玉山，2020，〈我們與戰爭的距離有多遠？霸權間的小國戰略〉，<https://research.sinica.edu.tw/global-strategies-pivot-hedger-partner>，查閱時間：2022/5/5。Wu, Yu-Shan. 2020. “Women yu zhanzheng de juli you duoyuan? Baquan jian de xiaoguo zhanlüe” [How Far Are We from the War? Small State’s Strategy between Hegemons]. (Accessed on May 5, 2022).
- 吳崇涵，2018，〈中美競逐影響力下的臺灣避險策略〉，《歐美研究》，48（4）：513-547。Charles Chong-Han Wu. 2018. “Zhongmei jingzhu yingxiangli xia de taiwan bixian celüe” [Taiwan’s Hedging Policy Under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EurAmerica*, 48 (4): 513-547.
- 李昌衡，2012，〈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時代韓中軍事關係的發展方向〉，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二十一輯）：32-37，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Li, Chang-heng, 2012. “Zhanlue hezuo huoban guanxi shidai hanzhong junshi guanxi de fazhan fangxia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Korea-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In the Center on Korean Studies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eds., “*Hanguoxue lunwenji*” [*Collected Papers of Study on Korea (no.21)*], pp. 32-37.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河凡植，2018，〈從文在寅總統上任來評析南韓與中國大陸關係〉，《展望與探索》，16（1）：28-34。Ha, Bum-Sig. 2018. “Tsong wentzaiyin tzungtung shangren lai pingshi nanhan yu jungguo daliou guanshi” [An Analysis of Sino-South Korean Relations since Moon Jae-in’s Taking Office].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16 (1): 28-34.
- 門洪華，2013，〈中國大國關係的演變與發展〉，門洪華主編，《中國外交大佈局》：68-83，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Men, Hong-hua. 2013. “Zhongguo daguo guanxi de yanbian yu fazha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cy on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In Hong-hua

- Men, eds., “*Zhongguo waijiao dabuju*” [*China’s Overall Arrangement on Its Diplomacy*], pp. 68-83. Zhejiang: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門洪華、劉笑陽，2015，〈中國夥伴關係戰略評估與展望〉，《世界經濟與政治》，2：65-95。Men, Hong-hua and Shiao-yang Liou. 2015. “Jungguo huo ban guanshi janliue pinggu yu janwang” [The Assessmen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Partnership Strateg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65-95.
- 洪停杓、張植榮，2004，《當代中國外交新論》，香港：勵志出版社。Hong, Ting-shao and Zhi-rong Zhang. 2004. *Dangdai zhongguo waijiao xinlun* [*New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Hong Kong: Endeavour Press Limited.
- 洪銘德，2015，〈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51：147-165。Hung, Ming-Te. 2015. “Meiguoguo chungfan yajou jengtse jr yanjiou” [Pivot to Asia: A Study of U.S. Regional Strategy].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1: 147-165.
- 凌勝利，2013，〈中國為什麼不結盟？〉，《外交評論》，3：20-33。Ling, Shengli. 2013. “Jungguo weishenme bujiemeng” [Why Didn’t China Ally with Others?]. *Foreign Affairs Review*, 3: 20-33.
- 高朗，2004，〈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21：19-48。Kao, Lang. 2004. “Hou lengzhan shiqi zhonggong waijiao zhengce zhi bian yu bubian” [Did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ally Chan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9-48.
- 陳麒安，2014，〈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問題與研究》，53（3）：87-115。Chen, Chi-an. 2014. “Chongxin jianshi wate de lianmeng lilun” [A Reappraisal of Walt’s Theory of Alliances]. *Issues and Studies*, 53(3): 87-115.
- 張潤，2014，《冷戰背景下的聯美抗蘇戰略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Zhang, Run. 2014. *Lengzhan beijing xia de lianmei kangsu zhanlue yanjiu* [*The Strategy of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Balanc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Beijing: Jiuzhou Press.
- 新華網，1997，〈中美聯合聲明〉，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 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84.htm，查閱時間：2021/1/6。Xinhua Net, 1997. “Zhongmei lianhe shengming” [China-US Joint Statement].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 新華網，2013a，〈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7/c_116319763.htm，查閱時間：2021/1/6。Xinhua Net, 2013a. “Zhong han mianxiang weilai lianhe shengming” [PRC-ROK Joint Statement on Facing the Future].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 新華網，2013b，〈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行動計劃〉，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8/c_116319885.htm，查閱時間：2021/1/6。Xinhua Net, 2013b. “Chongshi zhonghan zhanlue hezuo huoban guanxi xingdong jihua” [An Action Project on the Enrichment of China-Korea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 新華網，2014，〈韓國重申不加入美反導體系〉，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31/c_126568779.htm，查閱時間：2021/1/6。Xinhua Net, 2014. “Hanguo zhongshen bujiaru mei fandao tixi” [Korea Restated Its Unwillingness to Join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ccessed on January 6, 2021).
- 楊仕樂，2015，〈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解析〉，《全球政治評論》，50：103-114。Yang, Shih-Yueh. 2015. “Meizhong xinxing daguo guanxi de lilun jiexi”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PRC-U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0: 103-114.
- 寧騷，2000，〈選擇夥伴戰略 營造夥伴關係—跨入21世紀的中國外交〉，《新視野》，2：4-7。Ning, Sao. 2000. “Xuanze huoban zhanlue yingzao huoban guan xi—kuaru 21 shiji de zhongguo waijiao” [Selecting Partner Strategy and Constructing Partnership—The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panding Horizons*, 2: 4-7.
- 趙建民、許志嘉，2009，〈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

- 涵》，《遠景基金會季刊》，10（1）：1-44。Chao, Chien-min and Chih-chia Hsu. 2009. “Zhonggong disidai lingdao jiti de ‘hexie shijieguan’ lilun yu yihan” [China’s Harmonious World: Theory and Significance]. *Prospect Quarterly*, 10 (1): 1-44.
- 趙重陽，2014，〈淺論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巴西的戰略伙伴關係〉，《拉丁美洲研究》，36（6）：60-65。Chao, Chung-yang. 2014. “Chianlun 20 shihji 90 niandai jhongguo yu basi de jhanlyueh huoban guansi,” [On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36 (6): 60-65.
- 劉芸昕，2018，〈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已就修訂內容達成協議〉，《經貿法訊》，第234期，政大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34/2.pdf>，查閱時間：2021/10/16。Liu, Yun-xin. 2018. “Meihan tzyou mauiyi shieding yijiou shiouding neirung dacheng shieyi.”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had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Modified FTA]. *Economic and Trade Law News*, No. 234,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rade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ccessed on October 16, 2021).
- 韓聯社，2018，〈詳訊：韓朝商定4月底舉行首腦會談 金正恩稱願與美對話〉，<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306006700881>，查閱時間：2021/10/16。Yonhap News Agency. 2018. “Shiangshiun hanchao shangding siyuedi jiushing shounau hueitan jinjengen cheng yuanyu mei dueihua” [Inter-Korean Summit will be Held in April, Kim Jong-un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ccessed on October 16, 2021).
- 蔡明彥、張凱銘，2015，〈「避險」戰略下大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美中亞太戰略競合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16（3）：1-68。Tsai, Ming-yen and Kai-ming Chang. 2015. “‘Bixian’ zhanlue xia daguo hudong moshi zhi yanjiu: yi meizhong yatai zhanlue jinghe weili”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Great Powers under “Hedging”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U.S.-China Strategic Coopet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ospect Quarterly*, 16 (3): 1-68.

- 蔡東杰，2014，〈十八大後中國對外政策走向：區域與全球挑戰〉，《全球政治評論》，47：59-76。Tsai, Tung-Chieh. 2014. "Shibada hou zhongguo duiwai zhengce zouxiang: quyu yu quanqiu tiaozhan" [PRC'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Dilemma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47: 59-76.
- 閻學通，2014，〈大國外交得區分敵友〉，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08/5115961.html，查閱時間：2021/7/15。Yan, xuetong. 2014. "Daguo waijiao de chiufen diyou" [The Diplomacy of the Great Powers Must Distinguish a Foe or Friend]. (Accessed on July 15, 2021).
- 鍾永和，2018，〈中共針對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之立場與因應作為〉，《海軍學術雙月刊》，52（3）：76-90。Chung, Yong-he. 2018. "Zhonggong zhendui nanhan bushu 'sa de' xitong zhi lichang yu yinying zuowei" [The CCP's Position and Response to South Korea's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Navy Professional Journal*, 52 (3): 76-90.
- 魏嘉瑀、蔡亦寧，2018，〈「永久和平」在朝鮮半島露出曙光？細數南北韓領導人的三次會面〉，<http://www.storm.mg/article/429788>，查閱時間：2021/7/4。Wei, Jia-yu and Yi-ning Tsai. 2018. "Yungjiou han ping tzai chaushian bandau louchu shuguang? Shishu nanbeihan lingdauren de santsz hueimian"[The Existence of Permanent Peace in Korean Peninsula? An Analysis on the Three Meeting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Accessed on July 4, 2021).
- 蘇浩，2000，〈中國外交的「夥伴關係」框架〉，《世界知識》，5：11-12。Su, Hao. 2000. "Zhongguo waijiao de 'huoban guanxi' kuangjia" [The Framework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China's Diplomacy]. *World Affairs*, 5: 11-12.
- Acharya, Amitav. 2004.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3): 149-164.
- Babbie, Earl R. 2007.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Cengage Learning.
- Bong, Youngshik. 2017. "Continuity Amidst Change: The Korea-United States

- Alliance.” In Michael Wesley, eds.,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45-57. Australia: ANU Press.
- Cha, Victor D. 2003. “America and South Korea: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Current History*, 102 (665): 279-284.
- Cha, Victor D. 2016.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n, Steve. 2008.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 Cheng, Dean, and Ariel Cohen. 2013. “How Washington Should Manage U.S.-Russia-China Relations.” *Backgrounder* 284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thf_media.s3.amazonaws.com/2013/pdf/bg2841.pdf (April 20, 2021).
- Cheng, T.J., and Szue-Chin Philip Hsu. 2005. “Between Power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Re-thinking the Post-Cold War East Asia.” In I. Yuan, ed., *Rethinking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US, China, and Taiwan*, pp. 425-460. Taipei, Taiwan, R.O.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Chidley, Colleen. 2014.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kon*, 41 (1): 141-57.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11.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90 (2): 54-67.
- Chung, Jae Ho. 2007.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ung, Kyung-young. 2015. “Debate on THAAD deployment and ROK National Security.” *East Asia Institute*, http://www.eai.or.kr/data/bbs/kor_report/2015102615274064.pdf (April 20, 2021).
- Ciorciari, John. D. 2009. “The Balance of Great-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9 (1): 157-196.
- Clinton, Hillary.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89: 56-63.
- Clover, Charles, and Bryan Harris. 2017. “South Korea’s Moon Targets China Thaw

- during Beijing Visit.”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defbb28c-dfd6-11e7-a8a4-0a1e63a52f9c>. (April 20, 2021).
- Cohen, William S. 1999.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Historical Offic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http://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annual_reports/1999_DoD_AR.pdf (April 20, 2021).
- Cooper, Andrew F. 1997.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aily Record. 2016. “Hydrogen Bomb Test act of Self-defense, Says North Korea.” *Daily Record*, <https://www.springfielddailyrecord.com.au/news/nuclear-test-causes-tremor-around-north-korea/2891383> (April 20, 2021).
- Davenport, Kelsey. 2020. “Chronology of U.S.-North Korean Nuclear and Missile Diplomacy.” *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dprkchron> (April 20, 2021).
- Denmark, Abraham M. 2013. “Forg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5 (3): 129-136.
- Eisenman, Joshua,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2007.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 ENotes.com. 1992. “Joint Declaration at U.S.-Russian Summit.” <http://www.enotes.com/topics/joint-declaration-u-s-russian-summit> (April 20, 2021).
- Envall, H. D. P., and Ian Hall. 2016. “A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s: New Security Practic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8 (1): 87-105.
- Ferguson, Niall, and Moritz Schularickz. 2007.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 (3): 215-239.
- Fiammenghi, Davide. 2011.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 (4): 126-154.
- Friedberg, Aaron.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W.W. Norton & Company.

- Goh, Evelyn. 2005.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16,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 Goh, Evelyn. 2007.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3): 113-157.
- Han, Sukhee. 2008. "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 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0 (4): 335-351.
- He, Kai, and Huiyun Feng. 2012.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9 (5): 633-644.
-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17. "THAA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ACKGROUNDER ,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https://isdp.eu/content/uploads/2016/11/THAAD-Backgrounder-ISDP-2.pdf> (April 20, 2021).
- ISDP. 2021. "Not a Sovereignty Issue: Understanding the Transi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al Contro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h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https://isdp.eu/publication/not-a-sovereignty-issue-understanding-the-transition-of-military-operational-control-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south-korea> (April 20, 2021).
- Jackson, Van. 2014.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4 (3): 331-356.
- Jung, Sung Chul, Lee, Jaehyon and Lee, Ji-Yong. 2021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 (127): 53-68.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56.
- Kang, David C. 2005. "Rising Powers, Offshore Balancers, and Why the US-Korea

- Alliance is Undergoing Str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14 (2): 115-140.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09.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 (1): 1-28.
- Kastner, Scott. 2016. “Buying influence?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 (6): 980-1007.
- Kastner, Scott, and Phillip C. Saunders. 2012.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1): 163-177.
- Kim, Jack, Ben Blanchard, Paul Tait, and Robert Birsell. 2016. “China Says South Korea’s THAAD Anti-missile Decision Harms Foundation of Trust.”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korea-thaad-china-defence-idUSKCN1050Y7> (May 5, 2022).
- Kim, Jiyeon, John J. Lee, and Kang Chungku. 2017. “A Shrimp Between Two Whales? Koreans’ View of the US-China Rivalry and THAAD.” *The Asan Institute*,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a-shrimp-between-two-whales-koreans-view-of-the-us-china-rivalry-and-thaad> (April 20, 2021).
- Kim, Sung-han. 2019. “US-China Rival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Asan Forum*, <https://theasanforum.org/us-china-rivalry-and-the-future-of-the-korean-peninsula> (July 4, 2021).
- Koga, Kei. 2018.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 (4): 633-660.
-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2021. “By Nations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Database,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1. https://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360&tblId=DT_1R11006_FRM101&language=en&conn_path=I3 (October 17, 2021).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2): 159-185.
- Kuik, Cheng-Chwee. 2016. "Malaysi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at Do Weaker States Hedge Against?" *Asian Politics & Policy*, 8 (1): 155-177.
- Lake, David A. 2007.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1): 47-79.
- Le, Hong Hiep. 2013.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5 (3): 336-368.
- Lee, Seong-Hyon. 2021. "Seoul's Up-and-down Romance with China amid US-China Rivalry: A Korean Perspective." *China Report*, 57 (3): 309-326.
- Lemke, Douglas, and Suzanne Werner. 1996.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 (2): 235-260.
- Li, Quan, and Min Ye. 2019. "China's Emerging Partnership Network: What, Who, Where, When and Why."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3 (2): 66-81.
- Lim, Darren J., and Zack Cooper. 2015.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24 (4): 696-727.
- MacDonald, Paul K. 2018. "America First? Explain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rump's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3 (3): 401-434.
- McKeown, Timothy J. 2004. "Case Studies and the Limits of the Quantitative Worldview."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cLaughlin, Jonathan. 2018. "North Korea Missile Milestones - 1969-2017." *Wisconsin Project*, <https://www.wisconsinproject.org/north-korea-missile-milestones> (April 20, 2021).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Medeiros, Evan. 2005.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1): 145-167.
- Medeiros, Evan. 2009.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Mueller, John E. 1989.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 Myers, Steven Lee, and Jane Perlez. 2018. "Kim Jong-un Met With Xi Jinping in Secret Beijing Visi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27/world/asia/kim-jong-un-china-north-korea.html> (April 20, 2021).
- Perlez, Jane. 2017. "Rex Tillerson and Xi Jinping Meet in China and Emphasize Coop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19/world/asia/rex-tillerson-xi-jinping-north-korea.html> (April 20, 2021).
- Roy, Denny. 2005.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27 (2): 305-322.
- Sankaran, Jaganath, and Bryan L. Fearey. 2017. "Missile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in South Kore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8 (3): 321-344.
- Schweller, Randal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2006.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Sheen, Seongho. 2003. "Tilting toward the Dragon: South Korea's China Debat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theasiadialogue.com/wp-content/uploads/2017/11/a592023.pdf> (July 4, 2021).
- Rogowski, Ronald. 2004. "How Inference in the Social (but Not the Physical) Sciences Neglects Theoretical Anomaly."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Shambaugh, David. 2000.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42 (1): 97-115.
- Silva, Diego Lopes da, Nan Tian, and Alexandra Marksteiner. 2021. "Table 1. The 40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2020."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4/fs_2104_milex_0.pdf (April 20, 2021).
- Snyder, Glenn H. 1990.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1): 103-123.
- Snyder, Glenn H. 1997.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on, Daekwon. 2021. "Bringing North Kore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Unstable Foundations of Kim Jong-un's North Korean Regim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1: 295-325.
- Strüver, Georg. 2016. "What Friends are Made of: Bilateral Linkages and Domestic Drivers of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2 (2): 170-191.
- Strüver, Georg. 2017.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1): 31-65.
- The Korea Times. 2011. "Can Korea Hedge between US and China?" *The Korea Times*,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1/07/116_90538.html (April 20, 2021).
- The U.S. Census Bureau. 2021. "Trade in Goods with Korea, South." *The U.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800.html> (September, 2021).
- The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April 20, 2021).
-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2016. "ROK & U.S. Joint Statement: ROK-U.S. Alliance Agrees to Deploy THAAD."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https://>

- www.usfk.mil/Media/News/Article/831175/rok-us-joint-statement-rok-us-alliance-agrees-to-deploy-thaad (April 20, 2021).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 Walt, Stephen M. 2009.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61 (1): 86-120.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 Wang, Fei-Ling. 2018. “China and the Prospects of 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6 (2): 267-288.
- Wilkins, Thomas S. 2012.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8 (1): 53-76.
- World Bank, 202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0, PPP.”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orld Bank*,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 (July 1, 2021).
- Wu, Xinbo. 2014. “Agenda for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7 (1): 65-78.
- Wu, Yushan. 2017. “Pivot, Hedger, or Partner: Strategies of Lesser Powers Caught between Hegemons.” In Lowell Dittmer, eds., *Taiwan and China: Fitful Embrace*. pp.197-22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u, Charles Chong-han. 2019. “Why do States Hedge in East Asia? An Empirical Study on Hedging.” *Asian Perspective*, 43 (3): 557-584.
- Zakaria, Fareed. 2019. “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 Washington Squandered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98 (4): 10-16.
- Zhong, Zhenming and Yang Yanqi. 2020. “Alliance Forging or Partnership Building? China’s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under the Xi Adminis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5 (1): 62-77.
- Zoellick, Robert B. 200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April 20, 2021).